

編後語

中國發展主義的發展到了一個轉折點。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之後，國家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結構性弱點開始逐漸顯露出來，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各界精英的共識。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在如何落實這一共識的若干關鍵點上，中國的精英們卻全然沒有共識。其中的一個關鍵點，就是改革與革命的關係。

改革(或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永恆問題，在今天又一次激發了中國思想界的大激蕩和大混亂。當改革遭遇重重障礙而寸步難行之際，自然會出現對革命的期許。然而，革命的爆發要由眾多結構性條件來支撐，而這些條件在當今中國基本上並不具備。儘管如此，對於革命的憂慮依然瀰漫在中國精英之中，提防革命、恐懼革命、告別革命、反對革命的聲音不絕於耳。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書，經由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薦，而成為中國革命憂思的一個支點。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旨在從不同的視界為中國的革命憂思提供思考的平台。在美國芝加哥從事社區發展工作的甘儒彬(Robert T. Gannett Jr.)以旁觀者的身份，試圖解讀托克維爾對中國大轉型的意義。在托克維爾的筆下，旨在走向自由的革命往往呈現出一種令人糾結的悖論性結局：一方面，革命進程中難免的暴力和混亂會為力圖建立專制統治的強人煽動民粹情緒提供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革命也能成為「初級學校」，「在那裏公民將學會把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造與審慎的自我克制結合起來的必要技巧」。要防止第一種結局的出現，一個民族必須要警惕不切實際的空想家，必須要有崇尚品格而不是金錢的價值觀，必須要培育出具有行動能力的公民。但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這樣的警惕性、價值觀和行動力，究竟是革命不走偏的保證，還是革命的產物？

余盛峰的文章直面當今中國改革派精英的革命恐懼心結。在他的筆下，這派精英中的知識份子，不遺餘力地把一切形式的社會動員，把民眾的參與要求，把對壓抑與專制的反抗，都一股腦兒地歸結為「革命的激進」。革命恐懼的心靈深處其實是致命的自負：希望改革進程完全由精英集團掌控，而大眾則只能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們去參與政治。即便是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建設，似乎也未入改革派精英的法眼。然而，改革派精英寡頭壟斷改革進程主導權的格局，很難不是脆弱的。

法蘭西專制主義下的改革浪潮反而激發了大革命，而俄羅斯現代化的歷史則為滾滾紅輪所驅動，革命能否告別似乎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牽動。王進文通過梳理俄國政治和社會激進主義的歷史根源，告誡我們：僅僅警示革命的破壞性力量充其量是一種後見之明，更為關鍵的知識努力是挖掘滋養革命的土壤和探究製造革命的推手。